

隐秘而光荣

——探寻西南联大地下党往事

新华社记者 鹿明广

说起西南联合大学，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在极端艰苦简陋的环境中，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等学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

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既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又要隐秘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一所学校党员曾占云南三分之一

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二一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校园深处。留存于旧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等遗迹，无不诉说着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比如，北大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

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吴宝璋说，1938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易周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党员人数最多的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一。”吴宝璋说。

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联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在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她是党员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在长沙便受党派从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最终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潘琰，直到她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4年，29岁的地下党员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追杀学生。潘琰被手榴弹炸伤后，仍奋力抢救其他同学。暴徒用石块猛击她的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时，她已奄奄一息。

潘琰牺牲时年仅30岁，临终前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同学：“同学们，团结呀！战斗！战斗！”

“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员严格保密，潘琰的组织关系还没转来联大，所以学校没人知道她是党员。因为在学校表现突出，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还曾准备发展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龙美光说。

直到1981年2月，经中组部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她的党员身份才被后人所知。

吴宝璋说，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有15位师生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10名是地下党员。

“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但它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基层党组织。”吴宝璋说，掀起了国内内战、争民主高潮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西南联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联大红色记忆激励后人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回到北方，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则留了下来，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2011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在原“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基础上，成立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介绍，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年均接待海内外参观者90余万人次，其中每年开展青少年教育不低于10万人次。博物馆还组建了学生义务讲解队，每年提供义务讲解5000多场。

云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钱光美，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学生义务讲解队队长。“大学四年，课余时间、周末、寒暑假我基本都在做讲解员，每年要讲解上百场。”她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为来自四川的中学生参观团讲解，听完联大地下党员的故事后，很多学生已是泪流满面。”

如今，钱光美已成为昆明市云铜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去年12月1日，我在课堂上讲了西南联大地下党和‘一二·一’运动。孩子们应该铭记历史，记住在昆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她说。

26岁的党员杨永琴也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2017年从云南师范大学幼教专业毕业后，她主动回到家乡，在云南省楚雄市十分偏远的三街镇普嘎民族小学任教，成为这个高寒山区彝族村唯一的幼教老师。

“做讲解员时，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不仅努力学习，还心系民族存亡，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杨永琴说，“我希望能够像先辈一样，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等孩子们再长大些，我也会给他们讲西南联大、联大地下党的故事。”杨永琴说。（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烈士纪念碑(2月9日摄)



西南联大博物馆展出的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相关资料(2月9日摄)



西南联大博物馆展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画像(2月9日摄)
本组照片由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2月9日摄)



西南联大博物馆内景(2月9日摄)

牛线线——芮城县的刘胡兰式英雄



牛线线同志

委、妇女组组长牛线线。

一个匪徒假惺惺地走到牛线线身边说：“你年轻的，还有孩子，只要说出农会的情况，保你平安无事。”

“不知道，呸！”牛线线怒目而视斩钉截铁地说，又猛地吐了匪徒一口。

匪徒们无计可施，随即搬来一口铡刀，放在牛线线面前威逼着说：“再不交代，这口铡刀就是你的对头。”

牛线线临危不惧，厉声说道：“要铡便铡，何必啰嗦！”说罢，昂首阔步走向铡刀。

此刻，她猛然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心如刀绞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转身走到婴儿身边，撩起衣襟喂婴儿吃了最后一次奶。在喂奶时，她泪流满面地对着婴儿说：“孩子，你长大了别忘了你妈是怎样被害死的。”嘱咐家人黄海子将婴儿小金抱离刑场后，她整了整衣服，昂首挺胸，走向铡刀，英勇就义，时年30岁。

牛线线被敌杀害后，村上人都十分难过，都说她是一位刘胡兰式的英雄。

牛线线1918年生于河南某地，因家乡遭了水灾，和母亲兄长一起，颠沛流离，沿路乞讨来到山西，落脚到运城市东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搭起草棚，靠讨饭和给人打短工糊口度日。1938年日寇侵占运城后，他们母子三人生活更加贫困。因生活所迫，1940年，牛线线与芮城县东张村贫农黄俊结了婚。

虽说生活有了依靠，但仍很艰辛，尤其是

村中日伪奸、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所作所为，更令黄俊和牛线线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日寇投降后，黄俊一家人的生活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愈加贫穷，不得已，黄俊收钱替别人给阎锡山当了常备兵，维持一家老小生计。

1947年4月，芮城解放，东张村来了帮助贫苦农民翻身的工作队。在工作队长、共产党员史来锁的发动组织下，村上成立了农民协会。深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牛线线，参加了村上召开的几次大会后，人生第一次感到大家把她当人看待，心里豁然开朗，明白了要想过平安富足的日子，就得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打倒剥削穷人的地主恶霸，推翻三座大山。于是，她克服重重困难，说服阻拦的家人，加入了农会组织。由于她积极肯干、工作突出，被选为农会常委兼妇女组组长，亲自组建了妇女工作组。从此，东张村的妇女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她动员村里的妇女们加入组织，教妇女们唱闹翻身的歌曲，讲妇女们求解放的道理。贫农妇女李漂雪，一心想加入妇女组织，但婆婆封建思想严重，不让参加。线线知道后就三番五次登门做她婆婆的思想工作，最终消除了老人家不应有的顾虑，李漂雪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农会组织。

芮城解放初期，仍有不少阶级敌人和土匪

捣乱。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农会就组织妇女们站岗放哨，查路条，盘查可疑行人。牛线线曾对妇女组的姐妹们说：“我们不冤枉好人，但也决不放坏人。如果认为行迹可疑，就把他带到农会询问。”有一次牛线线亲自在村头站岗，碰上一个人，肩上扛着枪要进村。她要路条，这人没有，就把这人带到农会。经查询，才知道是自己的同志。

后来，妇女们编了一首小放牛歌：“早上五点钟，太阳往上升，小奴家去放哨，背着红缨枪，站在岗位上，东瞅瞅西望望，忽听脚步声响，过了一个人，盘查没路条，送他农会问，看我们妇女们，个个都威风。”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牛线线又组织妇女们纳军鞋、织军布，请老师教妇女们学习、识字。除了督促大家外，她还做样板，亲自教，亲自纺，亲自织，亲自检验，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她生活很朴素，经常穿着一身补丁叠补丁的黑色衣裳。没有烧的，就去地里拾大雁屎，在路上捡牛粪，没有吃的，她就挖野菜充饥。

尽管条件很差，可是一工作起来，牛线线就忘了一切。她当时已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正在吃奶的婴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不是把孩子放在家中让大的照看，便是带着孩子去工作，从未因家务事影响过妇女组的事。

为了让广大群众认识恶霸地主剥削压迫农

民的罪恶及欺压人民的凶恶本质，她经常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村中召开的斗恶霸地主大会。在会上，她一宗宗一件件控诉了恶霸地主的罪状，使广大群众认清反动派是吃人的豺狼，吸穷人血的恶鬼。在她和一些贫苦农民带动下，群众纷纷起来揭发了地主勾结日伪、勾结土匪残害群众的罪行。

1947年冬，胡宗南军再次进犯晋南，一时芮城又遭劫难，地主恶霸卷土重来，反动派还乡团趁机率回东张村，纠集反动武装，对翻身农民肆意报复，反攻倒算。村农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村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短短月余时间，有13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凶恶的敌人，逃不脱人民对他们的惩罚。1953年，人民政府将恶霸地主以及屠杀农会干部的刽子手全部抓获归案，让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牛线线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洒下了自己的满腔热血，献出了一片丹心。芮城广大群众没有忘记死难的烈士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于1977年在烈士们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座纪念碑，作为向后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南辽
通讯员 董少峰
照片提供 通讯员 董少峰